

從「九一八」到「七七」(上)

喬家才

關山煙塵記第一章

培養軍閥分化中國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晚上，駐瀋陽的日本軍隊先行破壞了柳條溝的鐵路，繼而向我北大營駐軍攻擊，這就是中華民族空前的國難「九一八」。日本軍閥發動這一次侵略戰爭，並不以佔領瀋陽，或者佔領整個東北為滿足。他們的慾望是永無止境的，不囊括我們一千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錦繡河山，不奴役我們佔有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黃帝子孫，絕不甘休。

日本軍閥的侵略路線，海軍主張南進，陸軍主張北進。不論南進，抑或北進，都離不了田中義一所說：『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戰略指導原則，所以絕不會放棄中國這塊肥沃的土地。日本軍閥於甲午戰爭後，處心積慮，圖謀我國，已非一日。假使不是國際間種種牽制，他們早就實行他們併吞中國的計劃了，還會等到九一八嗎？日本軍閥併吞中國的美夢，既然不能實現，於是就分化中國，

培植軍閥，製造永久不停止的內戰，使中國永遠不能統一，永遠陷於貧弱困苦的境地。因此，九一八以前的每一次中國內戰，都與日本軍閥直接間接，或多或少，有些關係。

日本陸軍有一種頑固的想法，既要北進，就須首先取得我們的東北，取得東北，才可以掃除北進的障礙，所以他們霸佔了旅順大連，旅大是東北的大門，東北的大門既已敞開，他們就可以隨時製造藉口，進軍東北了。當張作霖盤據東北的十多年當中，日本軍閥曾經用盡種種方法，想控制他，想利用他。假如張作霖乖乖地做一個日本軍閥的傀儡，則不用一槍一彈，東北便落入他們的掌握。可是張作霖具有中國人的氣質，並不甘心做一個漢奸奴隸，他對付日本軍閥的威脅利誘，時軟時硬，不即不離，硬是有他的一套辦法，使得日本軍閥既然痛恨他，又捨不得放棄他。本來張作霖在中國內戰方面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日本軍閥想要貫徹他們分裂中國的企圖，和製造中國內戰的策略，對於張作霖這種角色，就不能不遷就，就不能不善為利用。因此，日本軍閥一

方面痛恨張作霖不做一個服服貼貼的日本傀儡，一方面却又不能不支持他。張作霖就在日本軍閥的這種矛盾的心理之下，穩穩地做了十多年關東王。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公誓師廣州，揮軍北伐。當時孫傳芳佔有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直系軍閥雖然失敗，但吳佩孚尚控制有河南、湖北及四川一部份地區，又與湖南有密切關係。張作霖除了東北根據地，還據有關內的河北、山東、熱河、察哈爾，坐鎮北京，自稱大元帥。等到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如秋風掃落葉一般，進展神速，僅僅半年功夫，已盡克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若非國民黨內部分裂，正可橫渡長江，提師北進，掃平中原，統一中國。不意武漢政府被共產黨把持，而汪精衛從海外返國，不但不聽從黨內同志的勸告，反而甘心為共產黨利用，自稱國民黨領袖，與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悄悄離開上海，跑到武漢，與共產黨一鼻孔出氣，展開反南京，反蔣總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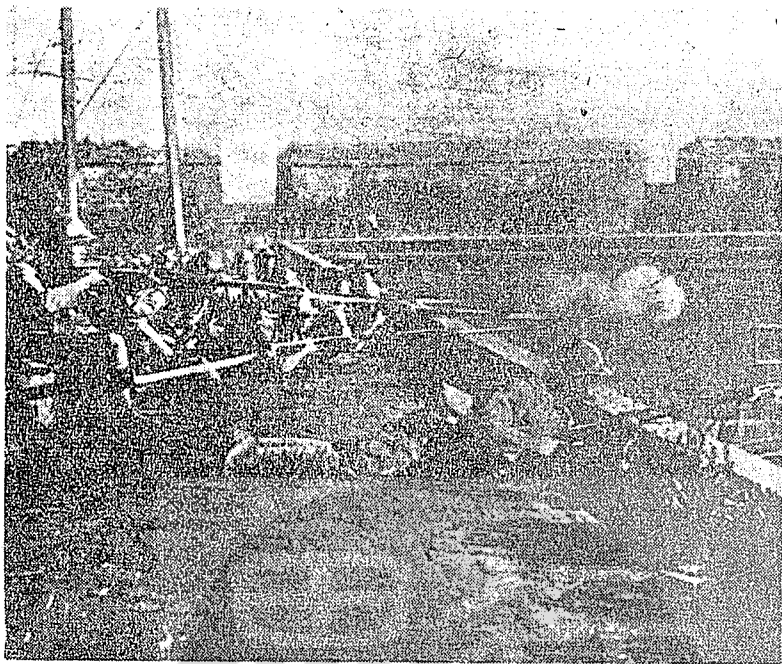
令的激烈活動，使寧漢分裂，越發加深。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清黨，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內清除出去。到了七月間，汪精衛也知道上了共產黨的當，不能再合作下去，在武漢分共，實際上也就是清黨，乃與南京謀和。總司令蔣公爲促成寧漢合作，於九月間下野，南京國民政府五委員胡漢民、蔡元培

、張人傑、李煜瀛、吳敬恆諸先生一同辭職。國民革命軍遭受如此重大的打擊，不但北伐受到頓挫，而孫傳芳渡江偷襲，幾乎死灰復燃。若非龍潭之役，將士用命，經過激烈戰爭，殲滅渡江敵軍，勢將斷送了北伐軍既得的成果。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蔣公復職，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日本軍閥深知山東的張宗昌抵擋不住國民革命軍雷霆萬鈞之勢，眼看中國就要完成統一，成爲富強的國家。於是福田師團出兵濟南，慘殺了

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造成可恥的「五三慘案」，企圖迫使國民革命軍同他們發生衝突，引起中日戰爭，扼殺北伐。蔣公看穿日本軍閥的無恥陰謀，忍辱負重，極力避免同日本軍閥衝突，統率國民革命軍繞過濟南，向北挺進，繼續北伐，日本軍閥的鬼計無以得逞。北京的張作霖也知道無法在關內與北伐軍對抗，只好退回東北老巢。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百川先生統率的晉軍，於六月八日在東北軍退出北京的當日，佔領北京，北伐遂告一段落。

民國廿年九月十八日，日軍在瀋陽城頭向城內攻擊我軍。



日本軍閥本來就痛恨張作霖不做他們的傀儡，現在又眼見他不是國民革命軍的對手，阻擋不住革命勢力的進展，不得不退回東北，非常不滿，於是動了殺機。他們想殺死張作霖，使東北軍羣龍無首，陷於混亂局面，

好趁火打劫。張作霖於六月二日離開北京，乘專車回瀋陽，六月四日經過皇姑屯的時候，日本關東軍河本參謀預先埋置的炸彈，準確爆炸，炸燬了張作霖乘坐的一節車廂，使張作霖受了重傷，回到瀋陽不久，終因傷重死亡。張學良得到這一個噩耗，知道日本軍閥不但炸死他的爸爸，同時也要謀害他，於是化裝成士兵，混在京奉路（後改北寧路）的三等車廂裏，迅速趕回瀋陽，不露任何破綻，穩定了東北局勢，結果，日本軍閥的如意算盤又落了空。

日本軍閥炸死張作霖，鑄成了一個莫大的錯誤。因爲這件事對張學良來講，是殺父冤仇，不共戴天，他絕不會再同日本軍閥妥協了。張學良既然痛恨日本軍閥，想報殺父冤仇，而國民政府又必須統一全國，東北一隅難以對抗，爲他自身計，爲國家計，都不允許割據的局面繼續存在，因此，促成他歸順國民政府的決心。張學良派他的參謀長鮑文樞秘赴南京，接洽歸附中央的問題，當時日本軍閥曾設法阻撓，但是沒有成功。於是東北全境終於民國十七年年底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中華民國至此歸於統一。

東北既然歸附中央，整個中華民國的力量就變成張學良的後盾了，不再是區區地方力量。張學良忘不了他父親慘死的悲痛，又得到整個國家的力量來支持，對待日本軍閥的態度比他父親時代更爲強硬。他積極充實力量，銳意經營東北。爲對抗日本人在東北的經濟勢力，積極興建葫蘆島，修築與南滿鐵路平行的縱貫線。這些措施，日本軍閥認爲對他們是致命的打擊，感到晝夜不



一九一八年事變日寇佔領東北後，東北義勇軍奮起奔赴戰場。

安，因此，促成他們趕快對東北下手的決心。

國民革命軍統一了全國，中華民國理應步上建設的康莊大道，可是我們多難的國家，並沒有真正得到和平。北伐完成後，蔣總司令召集全國軍政首要，協議編遣龐大而紛雜的軍隊，建立國防軍，以便埋頭建設，實行三民主義。不料當時少數統兵將領，狃於擁兵割據積習，陽奉陰違，加以政客奔走播弄，因而常有叛亂情事，目無綱紀，中央不得不下令討伐，遂有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的中原大戰，消耗了國家很大的元氣。新由德國教官訓練，裝備優良的教導第一師，也在這次戰爭中受了很大的犧牲。中原大戰係第二集團軍馮玉祥同第三集團閻百川聯合對抗中央軍的戰爭，政治上則以汪精衛在北平（北伐完成，改北京為北平。）召開的擴大會議來作號召。中原大戰拖延了半年多，雙方犧牲都很慘重。到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發出擁護中央的通電，率領東北軍進了山海關，形成對閻馮聯軍南北夾擊的態勢，閻馮聯軍瓦解，擴大會議散場，張學良又從閻百川先生手裏接收了他父親所失去的北平。

學生請願秩序大亂

張學良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的身分坐鎮北平，東北軍大部

份開進山海關裏，東北幾乎成了真空，所以給日本軍閥一個侵略的大好機會，終於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敵軍進展，非常迅速，東北軍毫無抵抗，就把東北四省失掉。全國人既痛恨日本軍閥的侵略行爲，更對張學良的不抵抗喪失了大塊土地，痛心疾首。於是請求對日宣戰，懲辦張學良，成了普遍的呼聲。共產黨絕不會放過這種機會，他們煽動各地學生，罷課遊行，赴京請願，希望造成一個大的動亂，好來發展他們的組織。當各地學生爭着赴南京請願，而被各地火車站阻止他們搭乘火車的時候，學生們起而反抗，有些佔據車站，有些集體臥軌，阻止通車，使全國交通幾乎陷於癱瘓，全國的各大都市幾乎都成了混亂狀態。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曾經召集一批青年幹部，詢問他們對於九一八以後的局勢如何處理？給他們三天的時間，仔細研究這一問題，提出具體意見。三天過後，這些幹部們一致主張對日宣戰，他們的理由是：「不戰而喪失土地，喪失民心；而日本軍閥的侵略又永無止境，可能導致亡國。於其不戰而亡國，毋寧一戰？」

委員長認爲他們的這種主張是幼稚的，錯誤的。當即昭告他們：「就我個人來講，最好同敵人一戰，不論戰勝戰敗，我都會成爲民族英雄，受到國人的崇敬。但是要顧到國家的利益，就不能這樣衝動、盲幹。要知道我們的一切力量，現在尚不足以對抗敵人，明明知道戰爭不能取勝，就會導致亡國，却要逞快一時，同敵人宣戰，這就是謀國不忠。所以我寧願忍受全國人民的責備，

此時此刻絕對不能對敵人宣戰，自取滅亡。現在我們應當臥薪嘗膽，確確實實從頭做起，準備一切作戰的力量，這才是要你們研究的，努力的方向。」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華民國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夾攻中，自身力量既不足以對抗外來的侵略，而共產黨的武裝部隊又盤據江西的瑞金一帶，威脅着首都南京。共產黨隨時在等待時機，準備顛覆政府，搶奪政權。所以我們要對日本軍閥作戰，首先需要剝平共產黨的武裝力量，除去心腹大患，才可以不受牽制，全力對外。基於這種情況，蔣委員長定下最正確、最賢明的政策，一再向全國人民宣佈：『攘外必先安內』。

『九一八』雖然喪失了東化的廣大土地，出



一手製造偽滿洲國傀儡組織的日寇土肥原。

現了醜惡的傀儡組織偽滿洲國；相反的；『九一八』促使我們全國醒覺、團結，產生了新的力量，新的希望。全國上上下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開始了新的努力，新的奮鬥。

我們一方面整理舊有的部隊，一方面建立新軍，使軍隊有了新的裝備，新的訓練，成為現代化的堅強部隊。同時軍事幹部必須符合革命的要求，才能留在軍隊裏工作。努力上進的幹部加重了責任，落伍腐敗的一一淘汰。因此，軍隊的紀律格外嚴肅，軍隊的領導與團結也特別加強。對於共黨的武裝根據地，展開一次接連一次的圍剿，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原則之下，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包圍圈逐漸縮小，終於肅清盤據江西多年的共產黨老巢，消除了接近首都南京的心腹大患。

軍統局應運成立記

廬山訓練是一種積極措施，全國的行政軍事幹部經過一次集體訓練，在意識上，有了新認識，新觀念。在生活上，得到一種新的體驗，革除了舊有的惡習和作風。受過訓練的軍政幹部充分了解了國際形勢，國家政策，與民族前途的美麗遠景。更重要的改革，就是廢除硬幣，改用法幣。這種幣制改革，在中國歷史上是件大事，使國家的財政經濟大為穩定，奠定了現代戰爭的基礎。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使中國在思想上起了變化，道德方面也產生了波動，一

般人因為舊有的已經破壞，新的尚未建立，全國國民都徘徊在十字街頭。由江西南昌發動的新生活運動，給全國國民定下最合乎現代生活的準則，一方面恢復固有的好道德，一方面掃除幾千年來的不良積習。結果提高了全國國民的道德水準，建立了新的生活規範，使全國充滿蓬蓬勃勃的朝氣。新生活運動推行到全國，所造成的那種新氣象，可以說是空前的。這一種力量促成民族的自覺與復興，使國家從衰弱中強壯起來。

共產黨的組織嚴密，而我們的組織却是形式的、鬆弛的，所以在組織對付組織方面，國民黨不及共產黨。清黨以前，共產黨披上了國民黨的外衣，暗自發展他們自己的組織，同時挑撥離間，製造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把國民黨鬧的天翻地覆，幾乎被他們鬧垮。清黨以後，共產黨轉入地下，為了防止他們在各地活動，就必須加強自身的組織力量。所以我們建立了新的嚴密的組織，把許多青年納入我們的新組織，不被共產黨吸收和利用，保存了民族的新力量。

孫子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在過去我們不但不知道對方，連自己也弄不清楚。共產黨在國民黨內胡鬧，國民黨軍軍的陣容裏不斷發生異動叛變，都是因為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原故。現在既然準備同強過我們千百倍的敵人作戰，就必須知道敵人的一切，更須了解自己，那些是正的因素，那些是負的因素，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壞的。因此，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成立了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由戴雨農先生負責，鄭介民先生協助，展開一項最艱苦

的工作。戴先生領導的工作，是最神聖的，純粹屬於犧牲的。戴先生集合了許多最優秀、最勇敢、最愛國的青年幹部，付予冒險犯難出生入死的任務。這些幹部都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犧牲自我，做一個無名英雄。他們不求名，不求利，只是爲了信仰，爲了民族復興，去同敵人作殊死戰。

抗戰期間，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完全由戴先生負責，簡稱『軍統局』，日本軍閥對於軍統局的工作人員則叫做『藍衣社』。軍統局的工作於抗戰時期發揮了最大的功能，給予敵人最有效的打擊，完成許多艱苦的任務。就是在抗戰以前，也因這種工作的效能，對於避免內戰，瓦解叛亂，保存國力，起了極大的作用。如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兩廣事變，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閩變，都沒有流血，而消除了戰爭，使叛亂即告平息，第二處的工作成效實爲重要因素。

抵達北平任務艱鉅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的秋天，我被派到駐福州的憲兵第四團，擔任該團的團政治訓練員。當時每一個憲兵團，設一個團政治訓練員，三個營政治訓練員。我到福州剛剛兩個月，就返回南京，參加憲兵政治部召開的政工會。會後改調駐重慶的憲兵第三團團政治訓練員，偕同營政治訓練員湖北詹超同志，搭乘江輪，溯長江西上，飽覽長江沿岸風景，是一次最愉快的旅行。憲兵三團是一個具有光輝歷史的部隊，士兵的政治水準比較高。當他們民國二十三年間駐在

北平，擔任勤務時，曾發揮了憲兵任務的最高效能，使日本浪人、漢奸匪徒、共產黨份子非常畏懼，不敢放肆，給華北人民留下一種深刻印象。當時團長爲蔣孝先，副團長爲袁家佩，憲三團調駐重慶後，袁副團長才升爲團長。團部住在大樑子的一棟三層樓房，袁團長很重視政訓工作，我們的工作非常順利。

重慶除了早上的濃霧使人感到不太舒服，它是多姿的，不平凡的。重慶的物價非常便宜，一塊錢可供四個人吃一餐極豐富的午餐。生活在這個山城裏，相當舒服，我們都喜歡這個山城。我到重慶，只住了一個多月，一切剛熟悉，却又奉到命令，調回南京。袁團長覺得彼此相處的還不壞，很不願意我離開，開船之前，特意到朝天門碼頭，江輪上話別，一再叮嚀，如果不離開憲兵政治部，希望我仍舊回到憲三團工作。

我的新工作係第二處北平站站長，湖南周世光同志擔任站書記。在南京停留兩天，即偕同世光，匆匆忙忙搭乘津浦車北上。我們到達北平，已經快過年了，天氣非常冷。第二處在北平的組織，係一個區級單位，張炳華（炎先）先生任區長，浙江毛萬里兄任區書記。區下面設三個站，我接任北平第一站站長；湖南陳資一兄任北平第二站站長，專負責冀察政委會方面的責任；河北馬漢三兄任綏綏站站長，山東許揆一（先登）兄任站書記，負責平綏綏及察綏兩省的情報。我從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元月份起，正式接管了北平站的工作，由西單搬到沙灘居住，因爲房子太大，傢俱又太少，雖然住了萬里兄、世光和

三家，仍然覺得空空洞洞，看起來頗不相襯。同時區站的工作同志混住在一起，也不合秘密工作的原則，因此，我們決定另找房子，同萬里兄分開居住，最後搬到輔仁大學後身一條僻靜的小胡同裏，才定居下來。我們到達北平不久，張炳華先生就離開北平，由湖北李果誥先生接任區長。

我們到達北平，首先需要了解華北和北平的實際情況。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軍不抵抗喪失了東北四省，輿論大譁，民意沸騰，張學良推卸不了責任，只好放下職務，出國去避避風頭，北平軍分會由何敬之先生負責主持。自從民國十七年底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到何先生主持北平軍分會，坐鎮北平，才算是中央政府的權力真正控制了華北。軍分會在這一段時間的政治作用非常重大，因爲做得有聲有色，華北的氣氛大爲改變，使華北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增加了許多。可是日本軍閥絕不樂意中央的勢力在華北生根，於是提出所謂『華北特殊化』，不讓中央的力量繼續存在於華北，否則他們就要製造進一步的戰爭。當然在我們沒有準備好同敵人作戰以前，唯一的對策只有讓步，於是自民國二十四年夏天的『何梅協定』，所謂何梅協定係何敬之先生根據行政院長汪精衛的指示，與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定的協定。根據何梅協定中央軍黃杰將軍所部第二師及關麟徵將軍所部第二十五師從長城各口撤退，離開華北，同時國民黨也不能在河北省及平津兩市公開活動。北平軍分會不能繼續存在，所以憲兵第三團也被迫離開北平，繼之而來的是以宋哲元將軍爲首的冀察政務委員會。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並不是說日本軍閥對宋哲元有什麼特別的偏愛。在日本軍閥想來，宋哲元將軍的二十九軍既然不是中央的直系部隊，而且十九年還和中央軍打過仗，現在既經他們日本人支持，取得冀察兩省、平津兩特別市的政權，那就容易利用，也許將來會變成他們最理想的傀儡，所以日本軍閥對於宋哲元和二十九軍有一種單戀的想法。

日本軍閥非常明白，由他們直接統治侵略詐騙到手的土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爲了減低反抗，易於統治，乃運用『以華制華』的絕妙手法，製造傀儡組織，利用漢奸敗類來代替他們壓榨統治。偽滿州國是他們的得意傑作，最爲成功，於是鼓勵了他們去建立第二第三流的傀儡漢奸組織。日本軍閥又藉塘沽協定，嗾使漢奸殷汝耕割據冀東二十二縣，在通州（即通縣）成立了『冀東自治政府』，這是第二流的傀儡組織，比偽滿州國要差勁的多。日本軍閥對於冀察政委會也存有這樣的一種幻想，希望將來會變成他們的傀儡組織。

共黨支配北平學聯

當我們到達北平的時候，華北的情況正如日本軍閥所希望的那樣。宋哲元將軍的冀察政委會控制冀察兩省、平津兩特別市，閻百川先生雄據晉綏，馬鴻逵將軍佔有夏寧，韓復榘獨霸山東，表面上這些省份都受國民政府節制，骨子裏却各有各的打算。日本軍閥當然喜歡這種分割的局面，在他們想來，可以用威脅利誘的手段，各個擊破

，去建立各色各樣的偽組織，完成他們所夢想的『華北特殊化』。可是首當其衝的二十九軍就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容易利用。宋哲元將軍同他的高級將領們都是眞眞實實的軍人，知道國家民族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不願步溥儀、殷汝耕的後塵，墮落到漢奸地步。宋哲元將軍控制下的冀察政委會並不能變成溥儀的滿州國，或者殷汝耕的冀東政府。日本軍閥所夢想的華北特殊化，第一步就落了空，他們會甘心嗎？因此，慢慢地對冀察政委會也就厭惡了。

北平城裏有日本特務機關，有日本浪人，有漢奸走狗。這些傢伙在北平城裏橫衝直撞，無法無天，整天在找麻煩，製造糾紛，想鬧亂子。北平，簡直是一隻火藥箱，遲早會爆炸的。

中央秘密工作人員在如此情況下，必須絕對秘密，才不會招惹是非，發生危險。同時也要顧慮到將來情況更爲惡化時，工作不受影響，仍能應付裕如，便不能不講求技術。所以我們建立機關，力求掩護，以符合工作原則，絕不敢馬虎苟且。當時陝北共產黨的武裝部隊正竄擾晉西，我就以山西土財主的身分，聲稱躲避共產黨擾亂，搬來北平居住。我的岳老太太穿着一身黑緞子衣褲，戴着翠玉手鐲，講着滿腔山西土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山西老太太。我穿着春綢面子灘羊皮袍子，我太太戴着二兩重的赤金手鐲，十足的像個山西土財主的派頭。世光作爲我的大學同學，合租房子居住。助理書記正定孔覺民同志則扮成岳老太太的內姪，同我太太成了表姐妹，口口聲聲，二姐長，二姐短，像真的一樣。我們住的房

子係兩進院子，世光一家住前面的一進，我們同覺民住後面的一進，有後門通到房東家裏，彼此往來，不必經過大街。房東姓李，山東人，是個大家庭，又很有錢，他們看到我們的一切情況，對我這個山西土財主深信不疑。

北平是一座文化古城，國立大學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大學、師範大學，私立大學有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民國大學、華北大學、平民大學、中法大學、協和醫學院等。全國優秀青年來自各省，薈萃於北平，有就大學的，也有來就中學的，所以北平成了共產黨發展組織的重要對象。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在各個大學、各個中學非常活躍，北平學生聯合會（簡稱舊學聯）也控制在共產黨手中。北平的各個學校已經成了共產主義的溫牀，共產黨的職業學生在幕後操縱一切，民先份子氣焰萬丈，爲所欲爲。各學校充滿共產黨的論調，壁報標語幾乎都是反政府，反國民黨的。愛出風頭或者喜歡活動的學生，不是被共產黨吸收，也被他們利用。不愛管閒事，不作政治活動，埋頭讀書的學生有時也不滿意民先份子們的囂張作風，但是誰敢出面反對呢？結果北平各學校的氣氛成了一面倒，好像這些大學不受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節制，而是聽命於陝北延安的共產黨政府。有些投機教授爲了保持職位，討好共產黨的職業學生和民先份子，也高唱左傾論調，以罵罵政府爲前進。

各學校既然被共產黨的氣氛所籠罩，他們的組織基礎又很鞏固，所以我們在各學校所建立的

新組織，正像暴風雨中的一枝幼苗，脆弱的很可憐。在那種情況下，組織的發展非常遲緩，工作格外艱難。可是物極則反，當他們跋扈囂張，橫行到無以復加的時候，只要維護正義的有識人士登高一呼，許多飽受壓迫的青年就會起而反抗，形成一種力量，扭轉形勢。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主席、師大物理系主任楊立奎先生原先是支持舊學聯的有力教授，他以為學生聯合會是一個純粹的學生團體，應當予以支持。後來有一筆來路不大光明，數目不太小的款子滙給楊先生，要他轉交舊學聯，他才明白了舊學聯並不是一個沒有背景的學生團體，而是共產黨的附庸組織，他們反政府的政治主張和行動，完全是受共產黨支配的。楊先生覺得北平市的千千萬萬學生受了他們的愚弄和利用，是一種罪惡，於是大為光火，由舊學聯的支持者一變而為舊學聯的死對頭，毫不保留地予以無情的打擊。

楊先生不但厭棄了舊學聯，而對那批傳播那惡種子的左傾教授，專門領導青年們走入歧途，更為痛恨。有一天，楊先生在天津大公報第一版登載了一則啓事，標題是「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說他們不要無理，不要道德，是禽獸也。第二天，那些所謂新啓蒙運動的左傾教授張申府、陳豹隱等，也在大公報上登載一則啓事，答覆楊先生，說他們並沒有不要倫理，不要道德。第三天，楊先生又刊出一則啓事，說他所以要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就是希望他們不做禽獸，現在他們既然明白表示，不敢不要倫理，不敢不要道德，那就是他的警告生了效力，達到目的。

楊立奎先生是一位學科學的人，事理弄明白以後，堅持立場，絕不動搖。共產黨認為楊立奎最頑固，最可惡，是共產黨的頭號敵人，於是一封接連一封的恐嚇信件寄給楊先生，說要殺死他，說要請他吃炸彈，楊先生理都不理他們。楊先生個兒不太高，安徽人，穿一件剛蓋過膝蓋的藍布大褂，對於政治並不感興趣，這一次揭發舊學

聯的黑幕，同共產黨份子作對，完全激於正義，也是基於大學教授對於青年學生的責任感。我去看他，勸他還是小心一些好，不要太大意。他說他已活夠本了，果真共產黨徒殺死他，倒是成全了他，使他死的更有價值。他告訴我，所有的恐嚇信件，他看都不看，原封送給治安當局，他相信那些小丑們沒有勇氣敢殺死他。（未完）

讀者的指教

秀才與拔貢

程其恆

貴刊三月號，謝家孝先生撰「東雲章的早年」一文，「清制全省秀才十二年考一次，僅取一名」，按係指每縣取一名，大縣有取兩名者，又「廷試二場名落孫山之後，拔貢就等於白考，東允泰仍只有秀才資格」，有誤，按考拔貢，是資格考試，拔貢朝考，是任用考試，朝考即廷試，亦稱殿試，考不取，依然是拔貢，所謂「求官不到功名在」，即是此意，又「拔貢賽進士」，有點過甚其詞，吾鄉江西省有「拔貢是半個舉人」，「拔貢拔上天」的說法，筆者的先父蔭毅公是清朝最後一屆——己酉宣統元年拔貢，所以略知一二，請更正。

三十年沉迷科「舉」高敬恩

拜讀貴刊五月號載祝秀俠先生所撰「鍾榮光與嶺南大學」一文，至深感佩，惟文中有下列錯誤，敬乞惠予更正為禱。

一、鍾榮光先生為廣東省中山縣小欖鎮人，文中誤刊為小「欖」鎮。
二、先生自輓首句「三十年科舉沉迷……」文中誤為科「舉」沉迷，按先生在三十歲前，醉心科場，沉緬酒色，腐敗頹唐，不一而足，其後皈依基督，乃洗面革心，痛改前非，終生向善，成一代之宗師，其在自述中，有「年青時代的鍾舉人」一章，詳述其事，足與「虛囂懺悔錄」先後媲美。（編者附註，祝秀俠先生原稿並無錯誤，係校對疏忽。）

汪精衛與陳璧君的小錯

郁鼎彝

一〇一號「汪精衛與陳璧君」一文，閱後特補正數語：（一）50頁中欄第七行「可惜我記不得他的名字了」，應為陳耀祖。（二）51頁上中欄歐亞航空公司誤為「歐美」。（三）51頁中欄「西貢」應為「河內」。請參考。